

第二十三章 日伪四面楚歌

八路军挺进热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洲国不仅经济上很快急转直下，而且政治统治也迅速呈崩溃之势。这首先表现在，热河地区、即伪满的西南部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所突破。

热河，是汉蒙民族共同生息地区，地理上毗邻华北、内蒙，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九一八”事变后，各路义勇军和东北军曾一度云集热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以冯玉祥、吉鸿昌为首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还进行过著名的长城抗战。孙永勤等抗日游击队也曾以热河地区为基地，广泛地进行抗日武装活动。1935～1936年，日伪军警就在武力“讨伐”的同时，开始对热河地区抗日军民大肆进行逮捕和镇压，而且愈演愈烈，“讨伐”、逮捕和镇压的矛头，越来越集中指向八路军及其地下工作人员和抗日群众。但是，八路军在热河的抗日斗争，方兴未艾，继续发展。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提出以雾灵山为根据地开展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后，9月李运昌即奉派任冀热边特委书记，11月又派胡锡奎任京东特委书记，翌年5月，两特委合并，胡任书记，李负责军事。在此前后，1937年9月，中共河北省委

和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在天津组成了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该会决定在冀东建立地方组织、发动起义和建立抗日联军。与此同时，1938年2月，中共中央指示刚建立的晋察冀军区分兵挺进冀东。军区为此而编成的邓华支队，于同年5月又与八路军总部从山西北部派到平西的宋时轮支队合并为第四纵队，宋任司令员，邓任政治委员。此时，由中共河北省委所组织的冀东大暴动已准备就绪。中央指示，暴动日期以八路军主力到达冀东为准。第四纵队辖4个大队，加上下属部队，约6000人，6月中旬到达雾灵山。冀东大暴动择“七七”事变一周年发动，达到暴动条件的共15个县，暴动期间，共组成武装队伍10万人，其中冀东抗联为7万人，暴动起义军控制了面积30000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的广大地区。敌人虽然不能等闲视之，但因时值徐州会战，并准备武汉会战，兵力不足。因此，作为应急办法之一，特从伪满兴安军管区抽组甘珠尔扎布支队，由热河侵入华北，参加“讨伐”和镇压。而甘支队受关东军西南防卫区司令官滨本中将指挥。

在敌人的反复“清剿”和镇压之下，大暴动受挫，起义部队遭受巨大损失。但是，中共中央坚持在冀东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心。1939年上半年，冀东党的领导机关重新建立，并将挺进到冀东的八路军分成3个支队，汇同冀东抗联部队，分别活动，其中第三支队活动雾灵山西南的长城内外，即开始突入伪满境内。由于抗战已明显地进入相持阶段，1939年夏，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再次举行全面大暴动的方针，转而逐步建立大块游击根据地。在军队方面，将冀东抗联编为八路军，而冀东八路军统编为第十三支队（1940年改称冀东军分区），李运昌为司令员。1940年初，冀东部队又改编为第十二、十三两个主力团和一些游击部队。陈群任第十二团团长，包森任第十三团团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特别是华北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之后，日军越来越把“治安肃正”的重点，转向华北。因为，华北既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进行抗日活动的广阔战场，又是日本侵略者赖以进行“以战养战”的兵站基地。日本的华北方面军，自1941年春起，连续发动5次“治安强化运动”，其目的就是，妄图通过以军事扫荡为主的政治、经济、思想等的所谓“总力战”，扩大占领区。为此，日本侵略者首先在冀东开刀。1941年5月下旬至7月中旬，华北方面军进行了以“冀号作战”为名的冀东大扫荡。这次“扫荡”成了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的主要军事行动。日军出动的部队，除华北的第二十七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主力外，关东军的独立守备第一、第七、第十六、第二十七大队等也都参加逞凶。事实上，对于挺进到冀东的八路军的剿杀，关东军一向与华北方面军协同作战。例如，1941年2至3月，以霍号作战为名的对“蓟平密”（蓟县、平谷、密云）的扫荡，关东军驻热河部队即参与其间。当然，在此次冀东大扫荡中，除关东军外，还有伪满军参加。大扫荡开始后，关东军首先推进到长城一线将冀东八路军主力挤到丰玉蓟平原。由于冀东八路军事先缺乏战略侦察，准备不足，陷于被动。结果，冀热辽地区仅有的两个主力团，在扫荡中，人和枪都损失三分之一左右。

1941年夏，中共冀东党组织，汲取6月反扫荡的教训，决定恢复两个主力团的战斗力，并深入热河南部，扩大游击区。所以，自8月起，冀东主力团，即第十二团、第十三团的主力，在长城工作团、青平（泉）工作团以及其他地方党政干部配合下，很快开辟了都山区，并扩大了雾灵山区，从而使锦热线以南的山区都变成了八路军的游击区，一部分地区还成了游击根据地。只二三个月时间两个主

力团即基本上恢复了战斗力。此时的第十二团团长由曾克林兼任。因陈群团长于6月2日阵亡。

就在此时，冈村宁次接替多田峻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继续推行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进行所谓治安战。但是，太平洋战争迫在眉睫，兵力不足，华北方面军不得不把华北伪军，即治安军主力调入治安战的重点地区——冀东。到1942年秋，计有伪治安军的第一、二、三、四、五、七集团（旅），以及若干独立团，共20个团30000余人，进入冀东。与此同时，原在冀东逞凶肆虐的日军第二十七师团被调走。于是，冀热辽的八路军又不得不以来势汹汹的伪治安军为对手，展开新的较量。而较量的结果，八路军节节胜利，伪治安军一败涂地。从1941年12月中旬到1942年2月上旬，两军交战近百次，伪治安军被歼4个团，损失兵力总数相当于六七个团。1942年3月，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不得不把主力调回冀东。

日伪的华北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军事上在冀东没有打大仗。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冀东的军事扫荡，以伪治安军的惨败而告终。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此次卷土重来，主要是在冀东推行第四次以至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他们用重兵分区进行军事扫荡，打击八路军有生力量，妄图把八路军驱至外线，然后采取挖封锁沟、修封锁墙，建据点，筑碉堡，“剔抉”，镇压，组织自卫团，实行户户连坐等办法，将冀东这块越来越重要的咽喉地区，彻底敌占区化。因此，在第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等部队极端凶狂，制造了潘家峪、鲁家峪等震惊中外的大惨案。针对这种情况，冀热辽八路军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战略，不仅扩大了热南游击区，而向北越过了锦热线。当时，驻热河的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虽也配合华北的第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加紧控制热南，极力“集家并村”，制造千里无人区，但是向热河挺进的八路军主力团，不仅针锋相对同敌人作战，而且领导热南人民展开反对“集家并村”的艰苦斗争。这个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最为疯狂和敌后战场最为困难的时期。冀热辽地区的第十三地区和军分区，为了贯彻晋察冀军区和分局的指示，实行辖区内党政军民的一元化领导，将主力团地方化，将两个大团改为3个小团，并建立3个区队，以利坚持。同时，还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在战略上坚持“敌进我进”。所以，尽管抗日游击战争处于困难阶段，冀热辽兵力和人口都变化不大，而且面积还有所扩大，在长城外已伸展到辽西和锦热铁路以北的光头山地区。此时，冀热辽八路军的3个团：第十二团曾克林任团长，第十三团舒行任团长，新建的第十一团赵文进任团长。

冀热辽面积虽有扩大，但扩大部分均系新区，兵源、供给都有困难。况且，日伪在热河又加紧“治安肃正”，制造无人区。故中共第十三地区和军分区于1943年1月决定，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在1942年日军发动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失掉的冀东基本地区。冀热辽主力团先后发动两次战役，到1943年9月，不仅恢复了大部分基本区，而且全区都向四周扩大了。“东自临榆、西至通县、南临渤海、北到热中，都包括在冀热辽解放区之内。”

“1943年秋后，八路军主力团、地方主力区队和县区游击队人数超过1万人。全区已建立20个联合县，人口近400万。经过5年多的艰苦奋战，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终于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并且在继续巩固发展中。”^①当年夏，第十三地委已改称冀热边特委，并成立了冀热边行署。在军队方面，除3个主力团外，还建立了

^① 娄平：《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2页。

8个区队，其中有二三个区队是战斗在伪满热河省境内的。

长城千里无人区破灭

八路军挺进冀热辽，意味着伪满洲国的统治，自西南之一角，开始崩塌，这自然是致命性质的。日伪不能不全力堵补，以图维持。1938年9月，关东军设在热河的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部即推行其“治安肃正”计划。1939年，他们更加“密切注视冀东”，明确要求“扼杀来自共军（党）”的抗日者。而且，日本侵略者也十分清楚：“共军的行动都是有组织的和极其巧妙的”，所以，“避免陷入打苍蝇式的讨伐”，而是首先“把握其组织、系统、渠道等”，然后采取“急袭、奇袭、伏歼等战术”，妄图给八路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打击。同时，还辅以“治本工作和思想工作”。^①正是基于这种方针，1939年日伪沿热河边境设立100个哨所，并增加伪警察机构，实行“一村一派出所主义”。与此同时，大肆进行搜捕与镇压。1939年上半年，只是送交伪司法机关者即达619名，就地屠杀的所谓“严重处分”者3名。^②1940年，日伪的热河讨伐升级，同年1～7月，共“讨伐”290次，屠杀热河抗日军民2921名。^③

如前所述，“从一九四一年起，我军就在热河建立了游击区和根据地。”^④为了破坏这些游击区和根据地，配合华北方面军在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对冀东所进行的以“冀号作战”为名的

① 1939年6月5日，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部《关于昭和14年度中期以后西南防卫地区治安肃正指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597～599页。

② 日伪档案热警特秘第889号。

③ 伪热河省警务厅：《月报》，1940年9月份。

④ 李运昌：《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2辑，第541页。

大“讨伐”，关东军司令官命令热河日军进行为期1个月的所谓“西南部特别治安肃正”。^①及至苏德战争开始和“关特演”之后，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又从9月起，实施为期两个月的“时局应急西南特别肃正”，把“讨伐”扩大到伪热河省全省。当时正值冀热辽第十二、十三两个主力团，总结前此的失利教训，向热南大举开辟进军的时刻。因此，关东军有些发疯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不仅进入热南山区，而且建立了迁平联合工委和承德兴联合工委等。面对这种形势，关东防卫军^②根据关东军司令官的指示，经与伪满洲国政府策划，于1941年12月25日抛出了以三年为期的“西南肃正大纲”，从而把对热河地区的“讨伐”、镇压长期化了。在组织上，相应地把日伪军警、铁路警察队、行政司法机关和协和会等纠集起来，拼凑成受日军西南防卫司令部指挥的实施机关——“西南防卫委员会”。如前所述，日伪在热河地区“肃正”目标，主要是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与人员，而手段是：“讨伐”、搜捕和镇压同时并举。根据报道，在“西南肃正大纲”实施的第一年——1942年就进行了如下规模的屠杀与镇压：

参加“讨伐”兵力	66816人次
交战次数	347次
扫荡次数	366次
射杀	2886人
俘虏	343人
诱扣	854人 ^③

① 1941年5月24日关东军司令官关作命第26号命令。

② 关东防卫军于“关特演”期间成立，从此热河日军称关东防卫军西南防卫司令部。

③ 《满洲新闻》，1943年1月3日。

至于大规模的“一齐逮捕”的情况是，只1942年上半年，就进行154次，逮捕1293人。^① 1942年热河日伪军警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讨伐”镇压，主要是配合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冀东所进行的第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扫荡作战。双方联合进行将近一年的“讨伐”、镇压，目标是妄图消灭战斗在长城内外的隶属于冀东军分区的八路军8个主力团以及其他地方区队。但是，由于八路军采取了缩小队伍和“敌进我进”的战略，不仅未被消灭，而且在向热辽推进方面，又有新的进展。特别是，自1942年末起“冀东中共军大举入侵，西南国境地区的治安，亦趋于尖锐”。^② 因此，自1943年初起，关东军和伪满政府把全伪满洲国的“治安肃正”的最重点置于伪热河省。到同年7月，被调至伪热河省的日伪军警兵力已达如下规模：日军9个大队（其中1个大队是6月增派的），伪军4个旅和1个特设队，伪警，省警察队7个，县警察队27个，日本宪兵466名。^③ 此外，还有伪满宪兵200余名。当时，第九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安藤忠一郎少将在西南防卫司令官，他曾要求将驻辽阳的日军第二十九师团调往热河，但未克实现。关东防卫军司令官遂由各独立守备队抽1个大队到热河，因而麇集在热河地区的日军达9个大队。1944年春，关东军将第九独立守备队改编为第一〇八师团，继续驻热河地区。伪军的情况是：1944年总兵员数达2.5万人，包括步兵旅3，混成旅3，独立步兵团4，独立骑兵团1。

日伪在热河地区推行的“特别治安肃正”，是伪满最后一次，也是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和手段最为残酷的大“讨伐”、大逮

① 承德宪兵队档案第399号。

② 伪满司法部刑事司编，《中国共产党的对满策动及其治安对策——特以冀东、热河为中心》，思想特别研究第1号，1944年2月。

③ 1943年7月26日承德宪兵队报告，承宪高第229号。

捕、大镇压。不但日伪军警兵力不断增加，而且在历次“讨伐”镇压中干的最为凶狠的刽子手们也统统被调集热河地区。1943年秋，伪通化省的原班底——伪省长姜全我、先后两任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和皆川富之丞等^①调往热河，分任伪热河省长、省次长和警务厅长。与此同时，在“讨伐”抗联中“立功”出名者，诸如原通化省协和会的户仓胜人、伪第六军管区的赫慕侠、日本宪兵曹长长岛玉次郎，以及谋杀赵尚志的原凶、伪兴山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等，也纷纷麇集热河。此外，云集热河参加“讨伐”的三四十个伪警察队，很大一部分来自省外，其中包括以臭名昭著的叛徒程斌等为头目的伪通化省警察队。^②

日伪对热河地区的“讨伐”镇压，在手段上也是集历次“讨伐”镇压之大成。在武力“讨伐”的“治标”方面，由于“讨伐”对象是来自伪满之外的冀东，所以日伪军警多分布于邻近长城和边境的热河西部、西南部和南部地区。而且，早在1939年，热河的日伪军警就“可以越境到邻近满洲的地区”。因此，热河地区日伪军警的“讨伐”作战，例如1941和1942年的“讨伐”，不但与华北方面军直接配合，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越过长城跑到华北去追击抗日军民。不过，自1941年八路军在热河境内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后，关东军则在伪热河省的“南部国境地区”，开始积极建立所谓“国境防卫组织”。即在从丰宁、滦平两县附近起，至兴隆、青龙两县附近的“沿国境的国内地区”，以

^① 姜全我原系于芷山部下，初任伪军团长，后任伪通化省长。岸谷隆一郎和皆川富之丞在围剿杨靖宇后，先后调任伪国务院总务厅地方处长和伪治安部警务司特务科长，此次又同时调至热河。

^② 原伪通化省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丞于1943年9月调至热河后，将活动于兴隆县的热河省警察队划归其领导，而把由通化带来的几支警察大队（包括程斌大队）作为伪热河省警察队，其头目多为曾参加东边道“讨伐”的老手。除伪通化省警察队外，其他各省派到热河的警察队共有5000人，在各县活动。

日伪军中、小队（连、排）的所谓防卫据点为核心，把以伪警察警防所构成的所谓警防据点，和归屯并户所形成的“集家部落”、伪行政机关、协和会等联系起来，再加上“国境环形汽车路，和纵贯主要地区的汽车路”，以及“通讯手段”，构成阻止和肃清八路军和共产党的“讨伐”镇压体系。其中，对热河人民危害最深的是“集家部落”的建立和无人区的划定。最后二三年的武力行动，主要围绕和集中在这种所谓“匪民分离工作”上。

热河地区的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是1941年从丰宁县东卯地区和滦平县于营子地区开始的。1942年扩展到：丰宁县白草营、小厂、大滩等部分地区；滦平县汤河口、琉璃庙、长山峪等地区；承德县沙河口地区；兴隆县庙岭、半壁山、兰旗营等地区；青龙县横城子、双山子等地区。到了1943年，再进一步扩展到：丰宁县除县城周围6村庄外的全县、承德全县、青龙全县，以及喀左旗、喀中旗、围场县、兴隆县、隆化县和喀右旗的部分地区。^①即在所谓“国境各县之全部地区，或背后地主要治安不良地带”^②，都已归屯并户，建立了集团部落。截至1943年6月15日，在热河全境已建立了2236个集团部落，把30万户中国居民强行驱赶至这些被人们称之为“人圈”的“部落”之中。^③

无人区主要划定在邻近长城的地区和难以进行“讨伐”的山

① 喀左旗为要路沟、佛爷洞、子尔灯、白枣、三十家子、茶棚；喀中旗为七沟、松树召、黄土梁子、八里罕；围场县为官民；兴隆县为兰旗营子；隆化县为荒地、马家营子、太平庄、官地、县城南、三岔口、郭家屯；喀右旗为七家、旺业甸等。

② 伪满军事部思想战研究部：《西南地区治安问题之考察》，1944年4月。

③ 承德宪兵团：《警务报告》，1943年8月20日。该报告称：当时平均完成计划的82%。另据《满洲国现势》1945年版载：热河“集团部落”达3000个，户数18万户。

区。即：

滦平县——于营子、琉璃庙、四海沿前方地区；

丰宁县——东卯、白草营前面；

光头山地区——以光头山为中心的承德县、喀中旗和喀右旗的一部分；

五指山地区——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承德县、兴隆县和青龙县的一部分；

都山地区——以青龙县都山为中心的地区；

千予山地区——冷口以北地区；

五龙山地区——以五龙山为中心的承德、兴隆、滦平、密云各县的一部分地区。

这样，沿长城线就形成了一条“千里无人区”^①。特别在邻近长城的几公里内，烧掉房舍、驱除居民、禁止耕种，禁止出入。其它无人区，作法亦然。无人区以外的县旗所辖地区，亦根据情况，随时划定所谓“无种地区”，不准耕种和居住。

日伪在热河地区建立“集团部落”和划定无人区，当然也是为了割断抗日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过，热河地区有其特殊性。其它地区，建立“集团部落”一般是在武力“讨伐”之后，同时由于日伪军事力量较强，可以利用“集团部落”控制群众，遏制抗日武装活动。而挺进到热河地区的八路军，在华北有根据地，军事力量日益强大，即使暂时退出热河，也可以依靠根据地再不断袭击，包括对“集团部落”的袭击。^②所以，在八路军武装

① 长城千里无人区，东起山海关，沿长城线至独石口，南自长城内侧数公里至20公里左右之线，北面远达承德东北的老头山区，纵深100公里左右，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人口100余万。

② 例如据承德宪兵团1943年6月14日《警务报告》载，1943年4、5月，热河“集团部落”被袭击64个。

力量可能到达的地区，居民仍可在无人区坚持斗争。^① 敌人把房屋烧掉，人民再把它搭起来，就这样“烧”与“搭”反复进行斗争。有的房屋竟被敌人烧毁20余次。不过，由于建立“集团部落”和划定无人区，是阻止和扼杀抗日力量的关键性措施，所以，日伪军警的掩护所谓“大集家”和扫荡无人区的武力行动，愈演愈烈。他们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在偌大的热河地区，到处实行罪恶的“三光”政策。例如：1943年9月，日军南波部队带领日本宪兵，对承德县东河口村五指山和柳河屯区无人区进行扫荡，声称要“根除”“无人区的一切敌对因素”，毁坏抗日军粮食来源——“秘密农作物”。结果，摧毁房屋609栋，捣毁山寨131个，“严重处分”54人，踏毁农作物157公顷，逮捕共产党嫌疑69人，抢劫妇女67人，掠夺枪支、弹药、被服和粮秣若干。^② 大范围的大规模一齐扫荡，通常在每年春秋两季进行。1943年秋，日伪军在青龙县全县进行为期1个月的大扫荡，结果，花厂峪村就有22人被杀，大地乡南沟门、马尾沟200多人牺牲，而塌山一个乡就死了800多人。同一年，宽城老区人民，在敌人扫荡中牺牲者不下2000人。1944年春，日伪军对兴隆县的山区进行全面扫荡，3000多名无辜群众死于非命。^③

据不完全统计，热河地区因日伪残酷的“三光”政策而受害最大的兴隆、青龙、宽城、承德、丰宁、滦平、隆化等县，共有33万多间房屋被烧，16万多头耕畜受损，近40万亩土地荒芜，

^① 娄平：《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简史》，第80～91页载：在无人区有5万人拒不离开，坚持斗争，不过武工队只有1000人。

^② 承德宪兵队档案，1943年9月22日，承宪高第298号。

^③ 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暴行与血泪》，第12页。

7.5万人丧生，近3万人被捕。^①这数以十万计的抗日军民牺牲或被捕，有的发生于疯狂的“大集家”和对无人区的残酷扫荡，有的则是无数次“大检举”一大逮捕的结果。为了搜捕和镇压挺进到热河地区的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人员，在西南防卫委员会统一指挥下，设有庞大的镇压机构。首先是承德宪兵团，它调集了全东北十分之一以上的日本宪兵，并建立了宪兵游击队，其第一游击队队长就是原长岛工作班班长长岛玉次郎。伪满宪兵也组成了特务宪兵团，头目就是在东边道“讨伐”中指挥伪满宪兵连的桥本岬。伪警察队三四十支，除把从通化调来的几个警察大队，包括程斌大队变为伪热河省警察队外，还设立了以谋杀赵尚志的主犯田井久二郎为队长的侦搜队（通称特务班），该侦搜队分省、县两级，普遍设立。日本宪兵和伪满警宪混合编成的“对共调查班”，由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官安藤少将统辖，承德宪兵团长指挥。锦州铁路警护本队下属的古北口、承德、叶柏寿、赤峰等4支约700人的铁路警护队，也是十分凶恶的镇压队伍。他们配合日伪军，时而单独，时而会合，反反复复对热河人民进行搜捕和镇压。如前所述，1942年上半年，光是日本宪兵的“一齐检举”就进行了154次，即等于每天几乎进行一次逮捕。1943年初，承德宪兵团又以“基号作战”为名接连进行两次“大检举”：第一次，1月10日至3月8日，游击宪兵伙同伪警和铁警逮捕了5737人，绝大部分是所谓“下级分子”，实际都是普通百姓，而所谓“党政军人员”，总共不足10人；第二次，2月7日至3月5日，又逮捕了1050人，其中有八路第十二团、十三团战士13人，

^① 《日军侵华时期原承德地区部分县直接损失统计表》。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暴行与血泪》，第169页。

政工人员仅1人。^①1943年秋，日伪警宪又进行两次以“剔抉”为名的“对中央地下组织的检举”：第一次，9月11日至9月27日，地区波及到承德东南地区，即迁遵兴联合县政府有关地区；兴隆东部地区，亦属迁遵兴联合县政府有关地区；青龙县东南部地区，即青绥凌联合县政府有关地区；平泉西南部地区，即承平联合县政府有关地区。在这些地区，都以各该地区的日本宪兵队长为头目，伪满宪兵、警察、铁路警护队等参加，会同日军部队进行逮捕，结果958人被捕。^②第二次，10月16日至19日，在兴隆、承德、滦平及喀喇沁中旗进行，又搜捕292人。^③随同大逮捕行动的是伪锦州高等法院设在热河的14所特别刑事法庭，随捕、随判、随杀。所以，伴随反复不断的大逮捕的是频频发生的大惨案。例如：1943年3月的喀喇沁中旗光头山惨案，469人被捕，124人被屠杀或判刑。^④同时发生的兴隆县半壁山惨案，曾连续逮捕多次，每次都有数百名群众被捕，日伪警宪手持名单，按单呼叫，并指挥洋狗扑人撕咬。为了搜捕更多的人，日伪军警常常利用年节家人团聚的机会进行“大检举”。例如：1942至1944年，兴隆县每年春节前后都实行大搜捕，3年共捕12000余人，其中枪杀、刀砍、监押和赶送工矿服苦役者达11400余人。^⑤也是在兴隆县，1944年6、7月，还进行过“投匪家族大检举”，凡属八路军和革命干部家属，不分男女老幼，全遭逮捕，共500余人。

①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报告》，1943年3月至4月18日。

② 1943年11月5日伪热河省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亟致警务总局局长山田俊介的报告。热警特密37号269之4。

③ 1943年11月12日伪热河省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亟致警务总局局长山田俊介的报告。热警特密37号269之7。

④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报告》，1943年3月18日。

⑤ 兴隆县公安局调查报告，1954年3月6日。

然而，敌人的凶狂却无法改变历史的发展进程。长城千里无人区也阻挡不了冀热辽八路军的胜利进军。在热南山区根据地，约有200个左右自然屯，三五万群众，誓死不下山，誓死不进“人圈”，并有数以万计的群众参加民兵组织，与敌人周旋。八路军的武工队和挺进支队，也不断突入无人区或穿过无人区，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例如：1943年夏，三区队和承平宁的武工队，共300余人，长驱直入，顽强奋战，挺进到赤峰以南，开辟广大地区，还曾一举攻入宁城。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败势已经明朗，华北战场虽尚未结束相持阶段，但形势的发展对日军日益不利。1943年9月，日本侵略者拾起法西斯德国的招法，抽调宪兵和其它部队组成华北特别警备队，共5个大队，并首先将其第一大队派往冀东，配合驻冀东的日军第八混成旅团，与冀热辽地区的八路军作战。但是，1944年情况更加不妙，特别是1944年下半年后，日军在各个战场上都呈现大势已去之势。而且，中国的局部反攻已经开始。为了“确保满洲”，冀热辽成为日伪用兵的重点。1944年6月又扩编5个大队的华北特别警备队，把它的10个大队，全部派往冀东。不仅如此，同一年日本侵略者特从伪满军和伪铁警部队抽调1.5万人，组成铁石部队和铁华部队进入华北，被置于华北特别警备队司令官兼华北宪兵司令官加藤泊治郎中将指挥之下。一同入关的还有由热河伪警察队组成的所谓“一心队”，共10个大队，5000人。这些日伪武装，统统隶属于华北特别警备队，本部设在遵化，对八路军进行游击战。当时，无论敌方或我方，冀热辽已成为统一战场，万里长城已不是界线。特别是1945年1月，日本的本土决战方针已定，日本的中国派遣军的战略退却也将开始。这样，冀热辽不但成为我军收复东北的前进基地，而且也成了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战略撤退的唯一通道，因而双方斗争

极为激烈。但双方兵力对比，敌方七八倍于我。当时，除华北特警队10个大队，铁石部队和“一心队”外，还有日军3个旅团、华北伪军治安军主力和驻热河的伪军，总数达十七八万人，都云集冀热。尽管如此，当地我军主要以战斗力较强的日满军为对手坚持作战，并取得一些胜利。1945年4月，苏联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废除，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为在战略反攻开始时配合苏军解放东北，冀热辽军区根据中央意图从6月起分兵三路，开始了“挺北战役”，一路由遵化以北出关向锦热铁路和平泉等地进兵；一路从冷口以东向凌源、叶柏寿、建昌前进；一路自古北口以东出发指向隆化、围场。三路挺北支队共2000多人，迅速攻入热河地区，这意味着在苏军大举进军东北之前，冀热辽我军已在伪满的西南角打开总进军的缺口。

抗联小分队驰骋北满

与挺进到冀热辽的八路军遥相呼应，化整为零的抗联小分队，在北满大地继续进行活跃的抗日游击战争，它与冀热辽的抗日武装斗争呈南北夹攻之势，给日伪以威胁。

抗联各部在日伪的疯狂“讨伐”中遭受巨大挫折后，开始向苏联转移。因为，1940年春，抗联代表与苏联远东军区，经第一次伯力会议，达成协议，苏方允许抗聯部队入苏整训。1940年末至1941年初，抗联赴苏部队约达600人。为统一领导和管理入苏的抗联部队，苏方在其境内设立南北两个抗联临时驻屯所，即所谓北野营与南野营。

北野营：位于伯力东北75公里苏境黑龙江南岸费·雅斯克村，那里极少房屋，多系帐篷。该处亦称A野营。费·雅斯克村

离野营 2 公里，住有四五十户人家。野营中的主要成员是：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直属部队的部分人员、二路军二支队入苏部队，和三路军总指挥部部分人员。1941年，入苏的三路军三支队，亦属北野营领导。共300余人。

南野营：位于海参崴（符拉迪奥沃斯托克）和双城子（原名沃罗什诺夫，现名乌苏里斯克）之间的一小火车站附近，人称蛤蟆塘。原为苏军驻地，山高林密，人迹罕见。该处亦称B 野营。1940年11～12月，柴世荣所率领的第二路军五军一部首先来到这里。1941年，第一路军警卫旅和二、三方面军越境入苏部队 88 人，也集中到南野营。总数约200余人。

南、北野营经过整顿、改编，强化了党的组织。当时决定，除伤、残、病者外，分批返回东北，继续开展斗争。1941年3月上旬，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人员和第三支队王明贵部第一批返回东北。这是北野营。1941年4月上旬，驻南野营的部分人员，在金日成率领下，也返回东北，其任务是寻找魏拯民和第一路军总指挥部。然而，不久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同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苏方提出抗联部队停止大批回国。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1942年7月16日，苏方同意将驻苏南、北野营及在东北坚持活动的抗联部队，统一编为1个旅。7月22日，苏联远东军司令官阿巴纳申大将接见东北抗联领导人，任命周保中为中国特别旅旅长，张寿篯为政治委员。苏联远东军司令官强调，该旅是将来中国东北组建 6 个军的基干。

7月23日，周保中、张寿篯在伯力写信给南、北两野营负责人，通知他们决定成立抗联教导旅。8月1日，教导旅组建完成。旅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张寿篯，副参谋长崔石泉。旗下共编 4 个步兵教导营，2 个直属教导营（无线电、迫击炮）。1944

年又增设自动枪教导营。全旅官兵共1000余人，其中苏籍官兵300人左右，抗联部队700余人。抗联教导旅在名义上系暂由苏联远东军总部代管，接受苏联远东军独立第八十八旅的正式番号。对外称第八四六一步兵特别旅，又称国际旅，但在内部保持抗联的独立性。1942年9月13日，抗联教导旅正式成立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

《苏日中立条约》签定后，抗联主力部队大批返回东北受到限制，抗联教导旅遂决定派小部队回东北，继续执行抗日游击战争的各项任务。所谓小部队，人员二三人、十多人或二三十人不等。活动时间十几天，二三个月，最长者1年以上。1941年整个夏季，北野营先后派6个小部队，还有个别派遣人员，总共约50名以上。南野营也派出3个小部队，近60人。抗联小部队规模虽小，但它的出现，对日伪颇具威胁力，因而日伪对来自苏联的抗联小部队，谈虎色变，神经特别紧张。抗联名将赵尚志赴苏较早，并一再由苏返回东北领导抗日武装斗争。1941年底，他由苏潜回至鹤立岗县北部。获此情报的鹤立岗县警务科和该县兴山警察署，在震惊之余，执行了一套诱杀赵尚志的阴谋。两名汉奸密探——1号刘德山，2号张青玉，先后进山打入赵尚志一行，因赵的一行5人中有人曾与1号密探结过盟。1942年2月12日，刘、张两个密探用袭击梧桐河伪警察警备的计划，诱骗赵一行下山。当晚月色分明，张青玉在前引路，赵尚志一行居中，刘德山在后。一列纵队行至梧桐河北约2公里的吕家菜园子时，刘德山突以步枪从背后偷击赵尚志，使赵腹部受了贯穿性枪伤，另一名战士也身负重伤。赵尚志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虽然还击打死了民族败类刘德山，但是听到后面枪响的张青玉早已拔腿奔向梧桐河伪警察警备队报告。20多名伪警察队员到达现场后，还想审问业已避进附近

土房的身负重伤的赵尚志。赵却“闭口不语，只是斜视审讯官，对自己的痛苦也一声不响。”^①后因伤势过重英勇牺牲。当时，日本侵略者惟恐赵尚志的到来会酿成鹤岗煤矿30000工人起义，并在整个北满重新点燃起抗日烽火。

赵尚志小分队只是1942年苏联抗联野营派遣活动之一。就南野营而言，1942年全年计划派遣7个分队和1个预备队。后来在执行中略有变化，从3月份起，先后有6支小部队潜回东北进行活动。3月20日，陶净非小分队进入中东铁路的五常老爷岭一带活动，8月陶等牺牲。3月25日，季青小分队12人，前往中东铁路以南的宁安、东京城一带活动。4月27日，崔贤小队10人，经绥芬河大甸子沿图佳铁路线南下，进入汪清、图们、延吉一带。9月，他们在大流水沟曾抓到汪清北蛤蟆塘伪警察署密探4名，将其枪决，之后又捕杀了窜入罗子沟的日本宣抚班头目吴东环。继续派出的小分队还有：5月13日出发的朴德山小队，5月29日出发的安吉小队；7月17日出发的柴世荣小队。他们进行一段活动后，分别于同年10月、11月返回苏联野营。

北野营制定的1942年派遣计划规定，派金光侠、李景荫、高万有、王文发、赫永贵、夏振华等6个小分队，每队五六～七八人。其方向，一是密山、宝清、穆棱、林口为中心的吉东地区，一是一以北黑铁路两侧为中心的孙吴、北安、德都、讷河等地。实际执行情况是：1942年金光侠小队与高万有小队合并，他们前进到林口以北、勃利西南、密山以北、宝清以南地区，监视牡丹江至林口间、密山至虎头间的铁路沿线敌人军事部署和运输状况。

^① 1942年2月19日三江省警务厅关于射杀前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赵尚志的情况报告，三警特秘第1044号。《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477～485页。

另一支是乔书贵、李忠义小队，共6人，他们前进到巴彦、绥化和庆城。在那里，他们与坚持在当地斗争的许亨植、张瑞麟小队取得联系。8月，许亨植牺牲后，乔书贵接周保中、张寿篯通知，继续执行侦察任务，最后吸收五六名忠诚勇敢的新队员返回苏联野营。1942年4月、7月、9月，先后还有孔昭礼小队四人、边凤祥、孙江、陈明等六人、陈雷小队5人，分别返回到铁力、庆城、绥化一带，北黑沿线和德都、克山、讷河一带，进行活动。

1943年已基本上停止成批的派遣，但苏方直接派遣的军事侦察活动仍在继续。抗联自身也持续进行军事侦察。到1945年为止，抗联收集到大量的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为苏军的出兵作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当然，抗联为此也作出了牺牲。只是南野营，1943年夏就损失了20余名战士。

除了转进到苏联野营的部队外，抗联还有少数部队坚持在东北继续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当然他们时而也退至苏联进行休整。坚持原地斗争，实力最强和给敌人打击最大的是抗联三路军各部，尤以第三支队为最。本书前编已经提及，以王明贵为首的第一支队，是抗联三路军的一支劲旅。1940年9月的克山县城战斗和继而进行的霍龙门战斗后，于1941年1月全队赴苏休整。同年3月返回东北战场。当时3支队共80余人，平均每人4颗手榴弹，500发子弹，每七八人有一挺机枪。他们到1941年夏，共进行大小17次战斗，缴获甚丰，特别是同年8月25日还攻克了阿荣旗震威庄的伪警察署，给敌人以威胁。因此，日伪军警对第三支队的围剿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第三支队最后还遭到了由海拉尔特务机关操纵的以鄂伦春族为主的一支由70余人组成的特务谋略部队的致命袭击。因此，至1941年底，第三支队在东北也难以

继，王明贵率11人赴苏。

抗联三路军其他各部的战斗情况是：1940年底，三路军总部的张寿篯、冯仲云、金策等赴苏参加抗联领导干部会议期间，参谋长许亨植等在铁力、庆城之间的大青山安帮河上游密营留守。总部之下有：第六支队，50余人，支队长张光迪，政治部主任朴吉松，根据地在庆城凌云山；九支队，40余人，支队长边凤祥，根据地在通北南北河一带；十二支队，40余人，在宣传主任张瑞麟、大队指导员钮景芳带领下，到达三路军总部后，按许亨植指示归第六支队领导。当时，抗联三路军总部加上第六、九支队，共有200余人。前面谈及，1941年8、9月间，九支队在讷河活动期间，郭铁坚等20余人牺牲，实力受挫。同年10月，金策由苏返回东北，前此7月间他被任为三路军政委。同年冬，第六、九、十二支队，共100余人，由六支队的于天放率领入苏。此后，三路军留东北坚持斗争的部队共有两支：一是以原第十二支队长朴吉松为首的10余人，在庆城、铁力一带活动；一是张瑞麟、钮景芳等六七人，在巴彦、木兰、东兴一带活动。队伍规模虽小，能量颇大。正是在他们的活动下，北满许多地方，特别是巴、木、东一带，群众抗日救国运动，如火如荼。两支小部队均由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领导，任务是：除发展抗日爱国组织外，还要储备粮食，侦察敌情。1942年8月，许亨植携警卫员赴张瑞麟部检查工作，返回总部途中，在庆城青峰岭山麓宿营时，被敌人从炊烟处发现，壮烈牺牲。但是，朴吉松小队仍在原地坚持活动。1942年9月11日下午，还成功地袭击了木兰县大贵屯，攻进南门伪警察所，夺取步枪9支，子弹300余发。10月14日，两支小分队又统一行动，以20余人的队伍袭击了庆城县大罗镇伪警察署，伪警察和自卫团全被缴械，获步枪24支，子弹2500发，放火烧毁了伪

警察署和村公所，解放被拘押的群众9名。

许亨植牺牲后，三路军小部队由金策直接领导。当时，小部队略有发展，决定将总数50余人的小部队编成3个小分队：于天放队10余人，在海伦、绥棱一带活动；朴吉松小队20余人，在铁力、庆城两县山区一带活动；张瑞麟、钮景芳等八九人在东兴、蒙古山一带活动。但是，由于天气日寒、给养困难，加以日伪疯狂“讨伐”，处境极苦。1942年末，朴吉松小队被击垮，朴在战斗中负伤后，被杀害于庆城监狱。于队后来也被打散。只有张、钮小队继续活动，但在1944年春也转移到苏联。

抗联二路军也有在东北坚持斗争的小部队，它是第二支队副队长刘雁来率领的18人队伍。活动地区，以饶河为中心，北到抚远，南至虎林独木河，西达宝清义顺号，密营基地是饶河爆马顶子。秘密活动任务是：侦察日伪兵力部署，搜集军事、政治、交通、运输等情报。1943年8月末，接周保中指示，第二支队在下江活动的全体人员，结冻时全部入苏。

1944年，大部分退入苏联的抗联部队，在东北没有大的动作。但是，时光跨入1945年，情况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1945年4~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后，东北抗联积极准备收复失地。当时，设在苏联野营的东北党委员会和抗联教导旅共同决定，在教导旅统一指挥下，动员抗联主力和分散的小部队，加紧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总反攻的伟大战斗。自1944年末起，特别是1945年上半年，抗联教导旅的军事训练日益紧张，并且所有训练都是在苏联统帅部统一部署下进行的。训练内容，也从游击战转向大规模的现代化进攻战。与此同时，在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指导下，反攻计划，也在加紧制定。

1945年5月，苏联远东军情报部长H·C·索尔金(王新林)

少将向周保中旅长传达了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官M·A·普鲁卡耶夫大将指示：预计对日将有相当残酷的战斗，第八十八旅随苏军进展，并在东北建立10万人的军队，参加解放东北和内蒙的战斗。据此，周保中、张寿篯拟定计划：现留东北的小分队，按指定地点，开展敌后游击战，执行战术侦察任务，配合苏军作战，派出空降部队，深入敌后，执行战术侦察，准备配合苏军作战，抗联随苏军进展。游击基础地区是：辽吉区——磐石一带；北黑区——北安、海伦一带，汤原区——汤原、桦川一带。

1945年7月，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部成立，并编成远东第一、第二和后贝加尔等3个方面军，准备分三路挺进东北。抗联教导旅，以独立步兵第八十八旅的番号，编入远东第二方面军，列为该方面军直属部队，随方面军前进，担任进攻佳木斯地区的作战任务。

1945年7月末，基于形势发展需要，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实行改组，原有人员一分为二：一部分反攻朝鲜；一部分反攻东北。组成新的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即辽吉黑临时委员会，该会将设于长春，下设若干地区委员会。

反统治反掠夺反奴役斗争迭荡起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面临的危机不单是军事方面的。战时高压统治体制的推行和紧急经济掠夺的实施，激化了一切固有的政治经济矛盾。工人、农民和社会各个阶层，为反抗法西斯高压、经济掠夺和全民性战时奴役，与日伪当局所进行的面对面斗争，其次数之多，范围之广，规模之大，超乎想象，前所未有。尽管这些斗争还难以汇集成更大规模的、同盟性的或全民性的斗争，但是，就是这些斗争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一无反顾的反

抗精神，也不能不使日伪统治者暗自胆战心寒。

1942年，系日伪当局推行战时紧急掠夺的第一年，东北人民开始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反掠夺、反奴役的广泛斗争。而且，斗争首先集中在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粮食问题上。据日本关东宪兵内部通报载：只1942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各地居民即为粮食举行13次斗争，1276人参加。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由于日伪强制“出荷”即征购粮食，广大群众早已无米下锅，迫于饥饿不得不起来斗争：5月22日，伪北安省德都县德都村育才屯140名居民，前往伪县公署请愿，要求配给粮食；5月24日，伪吉林省永吉县天岗村大火夥沟58名居民，向天岗伪警察署请愿，要求粮食；5月25日，伪滨江区阿城县阿城镇居民500人，前往伪街公所和县公署请愿，要求配给粮食；5月31日，伪北安省望奎县山头村居民代表屯长等6人，向伪警察署请愿，要求配给粮食；6月1日至10日，驻伪滨江区延寿县伪军骑兵团13人，得知居民缺粮少吃，向上级请愿陈情；6月3日，伪滨江区双城县兴进村窝棚屯61名居民，向该村警察派出所要求配给粮食；6月8日，伪滨江区阿城县天理村村长率居民300人，赴伪县公署为缺粮而请愿；6月9日，伪三江省依兰县协和屯居民38名（内妇女8名），向伪县公署请愿，要求粮食；同日，伪锦州市锦西县沙河营村，村长向锦西县协和会本部请愿，要求对该村22名伪国兵家属特配5000公斤粮食；6月10日，伪锦州市锦西县塔山村28名居民，前往锦西县协和会本部请愿，要求配给粮食；6月11~12日，伪锦州市锦西县塔山村居民80名，因缺粮，向锦西县协和会本部请愿；6月12日，伪滨江区阿城北满洲制糖会社代表30人，要求会社事务所配给粮食。^①这

^①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思想半月报》（6月前半月），1942年6月30日，关宪高第428号。

里所载只是许许多多事件的一部分。另据伪军的一份情报载：1942年5月13至16日，只4天时间，伪滨员省延寿县即发生如下5起粮食斗争事件：5月13日，该县李起村300人，因无粮向县当局请愿；同日，该县王河村500人，要求县当局配给粮食；5月14日，该县文化村、朝阳区、安山村、凌河村、魁兴区、洪山村、洪山区、长发村、金沙区、三河区等地朝鲜族代表95人，因粮食极端不足，要求当局配给粮食；5月15日晚10时，该县平安村东门外附近村民（人数不详）因饥饿，探知该村孙平南存有大豆3石、包米1石，进行了抢劫；5月16日晚10时，该县文化村朝阳区居民李大包、王占河等20多人，抢劫了“出荷”粮食，数量不清。^①这些一连串的事件发生后，日本宪兵队还曾派密探“黎明一号”之妻前往延寿县暗查事件背景，但未查出任何背景。该特务还报称：“亲眼看到7名饿死的”。^②上面只是1942年5月至6月上半月的情况。据载：6月下半月，因粮荒而发生的事件还有，请愿22件，1217人参加，抢粮1件，16人参加。^③7月前半月，粮食事件18件，641人参加。^④总之，随着剥夺人民口粮的粮食征购（即所谓“出荷”）日益疯狂，粮荒和由粮食问题所酿成事件，有增无减，而且参与者不仅有农民、城镇居民，而且广大工人群众也不得不为获得口粮而进行广泛的斗争。例如：1943年8月5日，东

① 伪军第四军管区司令部《情报》，1942年6月26日，四军参时局情报第46号（骑兵34团提供，确度：甲）。

②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情报》，1942年7月8日，关宪高第436号。

③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思想半月报》（6月后半月），1942年7月23日，关宪高476号。

④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思想半月报》（7月前半月），1942年8月7日，关宪高509号。

宁县城子沟，参加铁路工程的西松组工人130名，就因粮食配给而举行了全体罢工。当时负责供应粮食的工务段，由于缺粮，决定自8月起工人配给量每月减少5公斤，及至8月初配给8月份粮食时，又只配给一点小豆，工人忍无可忍，乃奋起罢工。^①自然，粮食恐慌不仅导致广大群众同日伪当局的不断斗争，而且，整个社会生活都动荡不已。“沈阳县农村，由于民食极缺，县内95%的农民缺乏食粮，大部分人脸色苍白，呈现半病状态，屡次发生偷粮事件，某部落一个月已达40多起。”^②

伪满末期，激发工人群众奋起斗争的因素，不单是饥饿，还有日伪统治和奴役问题。斗争形式，除请愿外，更多是罢工和摆脱奴役——逃跑。从时间上看，工人群众反抗斗争的加剧，也是和战时紧急经济掠夺的实施同步的。1942年4月19日，伪热河省喀喇中旗和青龙县强制摊派和抓捕的劳工700余名，准备送到王爷庙大石寨服役，当火车行至锦县车站时，200多名逃跑。5月5日，伪滨员省苇河县石头河站铁路修筑工人154名集体逃走，他们都是由哈尔滨“紧急供出”——抓捕而来的。6月3日，抚顺煤矿古城子采煤所123名特殊工人集体外逃。以上是百人以上的工人逃跑事件，至于几十人的逃跑事件，更屡见不鲜。而且，有的逃跑带有暴动性质。1942年6月7日，满铁阜新煤矿太平采煤所69名工人，因反对饥饿和劳务统制，突然向矿方警备员施暴，然后一齐逃跑。6月13日，该采煤所又有41名工人，因无粮食，突然

^① 铁道警护总队总监部《情报日报》，1943年8月28日，情报第3号。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4卷，“东北经济掠夺”，第612页。

^② 1943年8月“民食供求状况”，警务总局经济情报第285号。《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4卷，“东北经济掠夺”，第612~613页。

群起殴打警备员，然后逃走。^①此种以逃走为形式的斗争，也是随着岁月的推移，与日俱增。1943年10月13日，驻奉天的日军满洲七二〇部队所奴役的常工“苦力”200名，因其中1人的朋友私运粮食被伪警察逮捕，他们集体请愿遭拒绝，遂起而将伪警击伤，然后夺取被捕者，集体逃走。1943年11月29日，日军满洲六九三部队挖井工程现场工人50人，群起以棍棒还击任意殴打工人的日本监工，然后集体逃走。据统计，只是1943年11月份，抚顺煤矿就有3916人逃走，也就是每天平均逃跑130人。^②至于工人群众为各种原因而进行的罢工斗争，恐怕比逃跑事件还要多，规模也更大。1942年6月9日，伪三江省鹤立县兴山街石井砖厂400名工人，为增加配给粮食而罢工两天。6月12日，还是伪三江省兴山县，又有土木工人120人，为反饥饿而罢工。6月16日，伪锦州省锦西县土木工人300人，也是为增配粮食举行罢工。^③必须指出，在工人群众反抗日伪统治、奴役的斗争中，特殊工人的表现最有组织、最为坚决、给敌人的打击也最大，他们集中地体现了东北人民与日伪统治者势不两立的爱国精神。在这方面，典型事例是阜新煤矿下菜园子特殊工人大暴动。1942年“五一”大扫荡中，其中大量抗日军民被俘，集中于“石门劳工教习所”受训，然后分批被送到伪满，充当劳工，下矿挖煤。同年8月27日，大队长刘贵、副大队长崔溯源带300名到达阜新下菜园子，那里是一座名为“特殊工人大房子”的监狱，四周有电网，四角有岗楼。

^① 关东宪兵团司令部《思想半月报》（6月上半月），1942年6月30日，关宪高第428号。

^② 关东宪兵团司令部《思想对策月报》（11月份），1943年12月24日，关宪高第623号。

^③ 关东宪兵团司令部《思想对策月报》（6月后半月），1942年7月23日，关宪高第476号。

刘贵大队中有中共党员10多名，组成新邱特支，马良（即李振军）任书记。大队到达后即准备暴动，争脱虎口，特支积极支持。1942年9月2日夜12时，以哨音为令，刘贵任总指挥，开始暴动。王光带20几名突击队员冲向北门；阎锐率20几名突击队员向正门运动。但在此时，业已埋伏在正门外的日伪军，以密集火力封锁了道路。与此同时，宪兵队、警察警备队、日军、矿井队等从四面八方开来。刘贵、崔溯源等当场被捕，另有200多人被送到海州工人辅导所，该所后被改为矿工监狱。^①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不久在迎接黎明的战斗中，他们终于英勇地冲破了黑暗。被奴役在抚顺煤矿的特殊工人，也举行过暴动：1943年12月6日，在抚顺煤矿西露天矿服劳的特殊工人，约80人，因1名特殊工人被捕而进行暴动；12月15日，抚顺煤矿东乡矿特殊工人20余名，因1名特殊工人被殴打，用棍棒殴打了日本人劳务员。^②一般工人的罢工斗争，也日趋坚决。1943年12月1日至3日，长白县满洲土木会长白山森林铁路工程所使用的关内“劳工”，因未能按时归乡和未发放防寒被服而举行同盟罢工，参加者696人。12月8日又有150名因前次谈判条件不履行，再次举行罢工。^③

战时高压统治和紧急经济掠夺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导致社会各阶层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加一致的坚决反抗与斗争。1943年10月至12月下旬，伪热河省翁牛特左旗的11个村，349户，1895人，因虫害农业减产，但仍被强制出荷，生活艰难，不得不向伪兴安总

^① 中共阜新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办公室：《阜新党史资料》，阜新人民抗日斗争史料专辑，1985年，第135～144页。

^② 奉天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第1号，1944年1月9日，奉宪战第7号。

^③ 通化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12月份），1944年1月6日 通宪战第6号。

省林东、林西迁移。^① 1943年12月，哈尔滨道外有320家商店倒闭，勉强维持者也不得不部分转业归农，包括14家较大商店，他们把职工送到附近乡下种地，以谋生路。^② 与此同时，由于物资极缺，粮价猛涨，哄抢事件不断发生，社会秩序愈来愈乱。而日伪当局逼出荷、抓劳工、收缴金属、强制储蓄、征收各种战时物资，强令参加“勤勤奉仕”等暴政依然继续，并变本加厉，致使东北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争取解放的斗争意识，迅速增强。据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所掌握的情况，只是1943年11月份，至少在如下9处出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1943年11月1日，哈尔滨市道里炮兵街16电杆；11月9日，大连日军五三二部队板墙；11月10日，伪奉天省庄河县桂云花村芙蓉矿业所；11月12日，伪吉林省扶余街内公用厕所；11月19日，昭和制钢所弓长岭采矿所；11月25日，承德车站内公共厕所；11月26日，抚顺大山矿工人宿舍；11月26日，伪都新京日军七七部队工人宿舍；11月27日，大连山县街山县大楼，等。标语口号，除“打倒日本”外，还有“打跑日本救中国”和“八路军跃进满洲国境来了”。^③ 被迫在日本掠夺东北钢铁资源的昭和制钢所服劳的钢铁工人，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意志更为坚强，他们在鞍山小南山选矿厂、轧辊锭模厂、电修厂、矿山等处，写出了“打倒日本鬼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在化工厂洗煤车间铁柱上和炼铁厂办公楼墙壁上，还出现了用电焊条焊成的和用煤气熏成的“打倒日本帝国

^① 承德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12月份），1944年1月7日，未完高第5号。

^② 哈尔滨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第12号）1944年1月6日，哈宪战第1号。

^③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思想对策月报》（11月份），1943年12月24日，关宪幕第623号。

主义”。①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伪满时期，由于法西斯高压统治的实行，工人阶级组织罢工，特别是大规模罢工斗争，比较困难。因此，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不干活磨洋工”，就成为普遍采取反抗侵略的形式。当时，在东北人民群众中普遍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胡弄鬼，胡弄鬼，胡弄一会是一会儿。”例如，在昭和制钢所，那里监工制度是很严酷的，日本人监工和伍长对中国工人非打即骂，于是工人们便巧妙地进行反监管斗争。大家互相配合，轮流放哨。伍长或监工一到，放哨者立即用暗号通知工友，于是大家假装忙乱一阵，监工一走，立刻一切照旧。“蒙混”也是对付日本监工和伍长的一种办法。炼钢厂清渣工人在清渣时，渣车里面用木板垫起，表面上看装的是满车钢渣，实际里面是空的，推起来轻快省力，日本监工看了表示满意。矿工们“蒙混”敌人的办法是，爆破时，早不放炮，晚不放炮，专等工人下井才放炮。这样，日本监工为躲避烟火不进掌子。中国工人称此种办法为“炮迎鬼子”。还有一种“冲天炮”和“飞炮”，即把炸药绑在架子上放炮，听起来音响很大，实际上不起作用；“飞炮”就是把炸药倒装上，引爆后，炸药从炮眼飞出，同样不起作用。所以，日伪时期昭和制钢所的矿山掘进等项统计指标，有相当一部分是虚构的。总之，怠工和“蒙骗”日伪统治，是极其普遍的现象，作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时至伪满末期，东北广大工人群众已不满足于消极怠工或

① 解学诗、张克良：《鞍钢史》（1909～1948），冶金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382页。

“蒙骗”监工，转向利用一切机会，破坏机械设备，制造工程事故，使生产不得进行。所采取的办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不仅小规模的破坏比比皆是，而且大规模的人造事故也层出不穷。此种作法已成为广大工人群众加快敌人失败的有意识、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因而给日伪的打击是极其严重的。1943年3月5日下午1时，于哈尔滨市郊滨洲线庙台子西约6公里大榆树信号站附近，哈尔滨至满洲里的1列货车被颠覆脱轨，中国火车司机1名当即死亡。经检查，在铁路弯道上，15根道钉被拔，两处铁轨连接板被拆卸。事件发生在北满重镇哈尔滨附近，又正值日伪在巴木东地区进行疯狂镇压的关键时刻。因此，关东军把它作为重大事件责成铁路警护队查处。结果，狂抓滥捕了400多名无辜群众，最后将4人处死，3人处以10至20年徒刑。此即风闻一时的庙台子事件。^①这类破坏日伪军事战略设施的事件，此后亦有发生。同年12月12日，抗日者100名左右，在京山线雷庄至坨子头间（山海关起115公里处），使462次货车脱轨，并袭击列车，还夺走了警报用电话。^②在掠夺军工资源——特殊钢方面，本溪特殊钢会社举足轻重。该社最大炼钢设备是5吨电炉。1944年，有一天日本人亲自操作时，工人贾禄勋将钢水包的丝扣故意拧开，造成漏包事故，其他钢水放不下去，炉内钢水又倒不出来，只好停工，修理半年才恢复生产。^③1945年，弓长岭铁矿计划在岭东修筑一条小铁道，日本监工命令工人把3台小型蒸气机车运到山上，工人们开始

^① 战犯吉海忠之等编写：《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侵略史》，手稿，第1237～1241页。

^② 锦州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12月），1944年1月6日，锦宪威第5号。

^③ 《本钢史》编写组，《本钢史》（1905～1980），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0～132页。

时消极怠工，三天后把机车运到山腰时，暗中把最上面的1台撬一下，结果“轰”的一声滚到另两台上，3台机车全摔坏了，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小铁道也没有通车。^①

伪军、伪警和伪自卫团向来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中不乏爱国者。在伪满14年间，伪军、伪警和伪自卫团哗变、起义之举，不断发生，出身伪军警而为国捐躯者也大有人在。因此，日伪当局始终对于手握枪杆子的伪军警，采取既利用又戒备的政策。在伪军警中同样实行高压统治。1941年，随着《国兵法》的实施，和全面征兵制伪“国兵”的入伍，伪军实行全面大改编，即除将伪靖安军、兴安军改编为第一师、第二师，并归伪中央隶属外，主要是将各军管区所辖步、骑兵普遍缩编，重新隶属。^②而日本帝国主义愈是强化对伪军的控制，伪军争脱控制的反抗力就愈益强劲。1942年7月8日午夜1时许，于伪三江省抚远县东安镇，配属于伪第七军管区的伪军第一师靖安步兵第二团第二营第六连连长等90名（连总兵力193名，其中饶河留守74名，富锦留守31名，配属机枪1个排），起义入苏。原来接驻饶河日军的命令，该连王少尉等20人去东安镇南约25公里处进行“讨伐”，7月3日归来后，王少尉即与国中士等8人策划起义。7月4日，国中士等8人在武器库内准备武器。7月7日组成警戒、杀害、纠合等3个组。7月8日1时许从兵营出发，达乌苏里江下游，用捕鱼

^① 解学诗、张克良：《鞍钢史》（1909～1948），冶金出版社，1984年，第383页。

^② 第一师辖步兵团2，骑、炮团各1；第二师辖骑兵团2，步、炮团各1。此后，第一、二、四、六、八军管区各辖步兵旅1，混成旅1；第五军管区辖步兵旅2，混成旅1；各军管区还各辖骑兵团2。江防舰队改编为江上军，隶属陆军，撤除日本海军顾问。

小船16只，分批渡至苏境。^①他们受到抗联领导的热烈欢迎，正式被编入教导旅。此事发生后不到1年时间，还发生更使日本帝国主义震惊的五顶山事件。它反映中国人民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已铤而走险，奋不顾身。松花江下游三江平原，富锦县城东20华里处，有座五顶山，周围约百里，驻兵可控制松花江流域很大一片地区。这座山有5个峰顶，从空中俯瞰，貌似伏卧草原的一只狐狸，故人称其狐狸山。1940年以前，关东军即将其修筑为可容纳1个师团兵力的要塞。但因关东军大军南调，要塞归伪靖安军监守。1943年6月12日，伪满军事部大臣邢士廉，日本最高顾问、陆军中将楠本实隆，伪军政司长平川哲一少将^②来到富锦城外的由伪靖安军改编的伪第一师，然后由伪第一师师长山崎积陪同，由师司令部向五顶山进发。当时，驻五顶山的是伪一师二团。邢士廉等一行到达五顶山，刚要下马，便遭到二团迫击炮连1名士兵的狙击。士兵名常隆基，东丰县人。他的狙击不成功。原来乘马在前的楠本实隆，军服左上兜里揣着小记事本还别着一支金笔。常隆基的对面一枪，正打在金笔上，金笔打断，子弹却被小记事本挡住，楠本免于一死。常对邢士廉的狙击亦未奏效。伪第一师全员出动，但却未搜查到当即逃跑的常隆基。原来，常逃跑后在靠山屯一农家改装，并在松花江边找到一只小船渡到江北。但渔船主人是个特务，他把常当成抗联三路军人员押送到富锦。途中，趁押送的特务饮水功夫，常逃走。但此时靖安骑兵团已赶到。在他们的追捕下，常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① 关东盖兵团司令部：《防共情报》，1942年7月前半月。另据《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1991年，人民出版社，第450页载：起义为首者为都连升、国如阜、周岩峰。起义时他们打死1名伪军官和日本人电台台长。过江时有些人员失散，进入苏联境内71人。

^② 另有资料说平川是伪一师长。

“中华民族万岁”后，投江自溺身亡。^①事件后，伪第七军管区受到整肃，伪第一师也被调走。^②

不单是伪军伪警，不拿枪的知识界、文化界以至宗教界人士，也都更加踊跃地投身于抗日行列。尽管在“一二三〇”事件前后，日伪警宪对国民党地下组织和知识文化界多次进行镇压，然而他们的抗日斗争活动有增无减。这种情况雄辩说明，人民已普遍觉醒，抗日阵线正空前壮大，越来越多的人都争取在黎明前冲破黑暗的斗争中做出自己的奉献。日本帝国主义是惧怕一切抗日斗争的，但比起公开的反抗斗争，它更加惧怕隐蔽的地下斗争。因为一旦非常时刻来临，很可能正是突然迸发出来的巨大力量，里应外合地将他们置于死地。所以，日伪当局在其统治的末日，把对国民党地下组织、抗日联军和挺进到热辽地区的八路军，共同列为加紧镇压的三大重点目标。由此便不难理解，在伪满末期日伪为什么用那么大的气力去镇压国民党地下组织。前已提及，1944年4月开始的以“桃园工作”为代号的对国民党地下组织的大逮捕，和1945年5月开始的以“晓工作”为代号的对国民党地下组织的第三次大逮捕，实际是1941年末“一二三〇”事件的继续。两次大逮捕，都是全伪满的大逮捕，每次逮捕规模都是数百人。镇压显然是扩大了的，但它也反映了国民党地下组织是相当多的。“桃园工作”就破坏了7个国民党党团组织和3个外围团体。^③和“桃园工作”同时进行的，还有破坏三青团的“蓬工

① 李野光：《伪满军中的几次反满抗日事件》。《长春文史资料》1982年，第2期。

② 伪满第七军管区系1939年建立，1942年5月赫慕侠任司令官，他因五顶山事件受停职处分。同年伪第一师调至锦州。

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8卷，“东北历次大惨案”，第651页。

作”，和针对国民党招生委员会系统的“红叶工作”和“露营工作”。此外，1944年4、5月以破坏奉天第四国民高等学校爱国组织兴志会的“黎春工作”，和1945年4、5月间以“岭云工作”为代号对奉天第三国民高等学校爱国组织复兴会的破坏，都是专以青年学生为镇压对象的。宗教界的爱国表现与活动也成为动摇日伪统治的因素之一。所以，日伪撕下伪善面孔，对宗教界也大开杀戒。1944年11月对延边所谓青林教人的大逮捕，和1945年1月伪滨江省警务厅对哈尔滨各宗教系统的大逮捕，其规模都是很大的。

当然，在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斗争中，受共产党和抗联直接影响的群众，更为坚决。1944年10月，就曾发生双城事件。在抗联三路军领导和影响下，双城五家，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目的，由自卫团长组织了救国会，许多群众参加。10月某日，自卫团长和救国会爱国者携武器袭击了五家警察署。最后，虽遭到日伪的残酷镇压，9人被判死刑，17人被判15年以上徒刑，但是，它却开了伪满末期群众起义暴动的先河。1945年，首先发生前已述及的通河“四六”暴动。1945年4月5日夜12时，曾经给抗联第九军密送过枪支弹药的富有民族气节的伪警尉王金财率数名警察，打开设在康生院的伪矫正局大门，指挥被关押在那里180名群众，将伪警警备队全部缴械，放出被关押在伪警务科保安股拘留所的抗联营长谢洪升，打开伪警务科枪械库，武装起300余人的暴动队伍，打死日伪警特30余人，烧毁了伪县公署、警察署、汽油库和其它物资。这场通河“四六”暴动，最后虽然遭到日伪残酷镇压，180余名同胞牺牲，但它极大地震撼了日伪统治。而且，此后不久，桦甸八道河子和横道河子一带又爆发了农民起义。为首者系抗联某部连长王寿山，他自1945年3月就在那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活动，准备暴动。因秘密泄露，决定起义提前于7月1

日举行。当日由48人组成的暴动队伍，首先打垮了八道河子伪警察署，打死日本警察1名，用缴获的30多支枪武装了起义农民，继而暴动队伍赶到横道河子袭击伪警察分驻所，结果又缴获步枪等多支，撤退时将配给所的物资分配给群众，并带走一部分群众，准备奔赴抗日根据地。不幸，桦甸农民起义也遭到日伪军警的追剿和镇压，7人牺牲，30余人被捕入狱。^①然而，桦甸农民起义和“四六”通河暴动，却不啻为东北人民向日伪发起总攻的两次进军号。

必须指出，在东北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最后一战中，在日伪奴役下的数万特殊工人的先锋作用，不能低估。由于他们都是素有抗日经验的抗日军民，对敌斗争英勇果敢。他们自始至终采取越狱、逃跑和集体暴动的方式同敌人进行搏斗。以昭和制钢所为例，1941年末至1942年初，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特殊工人，突破重围，越狱逃跑。1941年12月以前逃离者达1118人，1942年为423人。昭和制钢所窑业工厂使用的特殊工人最多，1942年4月1日，该厂70多名特殊工人集体暴动，他们以扁担为武器同伪警搏斗，最后集体逃走，而残暴的日伪警宪竟用军犬搜捕逃走的特殊工人。1943年，该厂粘土车间又有40余名特殊工人集体暴动。^②前面说过，1942年9月，阜新下菜园子特殊工人曾举行300人的大暴动，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特殊工人的抗日怒火，在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前夕，终于迸发出来了。阜新平安监狱是日伪劳工监狱，建于1942年，最多时关押1600多人，看守110多人。1945

① 金官玉：《关于日伪桦甸县农民起义事件的调查报告》，1954年8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8卷，“东北历次大惨案”，第681～682页。

② 解学肯、张克良：《鞍钢史》（1909～1948），冶金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384页。

年8月8日，苏军对日宣战，阜新日伪当局开始动摇。狱中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和干部开始进行宣传鼓动，准备暴动。8月13日，看守王兆祥发现许多“囚犯”都在打绑腿和收拾行李。监狱监理课便把“囚犯”队长杨某找去，企图阻止，但杨未屈服，被判死。当日下午6时，暴动开始，以砖头为武器的200多人向南门冲去，结果逃出220多人，10多人被打死。领导人佐墨因伤被俘，后被敌人砍死。8月14日，狱中暴动再起，又有200多人逃出虎口。^①

① 中共阜新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办公室：《阜新党史资料》，1985年，第150～160页。